

刘双恩：

新中国海运事业的先驱者

刘功宜

1946年12月，刘双恩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任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奉命转香港工作，筹组海轮运送大量物资和大批民主人士到北方解放区港口，并参与策划指导了海辽轮、招商局、“两航”等起义，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刘双恩调北京工作，为新中国远洋、外贸运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秘密转移民主人士
为解放区运输物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当时，聚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只有乘坐海轮一途。由于香港与东北解放区存在海上贸易关系，组织上决定把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交给香港华润公司。

青年时期的刘双恩



此前，香港华润公司曾租用苏联籍、挪威籍船舶，分四批次完成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的秘密转移。在此期间，租船工作主要由王兆勋负责，熟悉华北航道的刘双恩则以普通海员身份协助外籍船长航行。北上民主人士不断增加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随着形势日益严峻，香港华润公司决定启用自己的船舶转移人员。经报中央批准，香港华润公司成立一家名为“华夏企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开始了自营远洋船队的尝试。经华夏公司总经理王兆勋推荐，刘双恩的组织关系转到香港华润公司，担任副经理，参与筹备和组织海外运输公司和船队的任务。

在刘双恩主持下，华夏公司依靠组织上提供的资金，购买了一艘3500吨英国二手轮船，并委托船厂改造成“客货轮”。与此同时，刘双恩秘密往返于上海、福建、香港之间，招聘航海人才。由于他曾经担任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的教官，并领导过学生运动，颇有人脉，不久就邀请到思想进步、航海知识丰富的34名航海专业人士（其中16名为中共地下党员）加入华夏公司，其中包括集美高水的校长、持有甲级船长证书的刘松志（共产党员）。1949年4月底，购置的轮船改造完成，取名“东方”号，由刘双恩担任第一任船长。由于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该船挂巴拿马国旗。5月，“东方”轮办理

好各种手续后正式运营，“东方”轮的首航，恰逢第五批民主人士北上。航行期间，刘双恩不断调整船速，利用夜幕的掩护，“东方”轮全船熄灯，全速前进，所有人一夜无眠，连厨工都被派去瞭望，在拂晓时分船舶终于安全通过台湾海峡，突破了最危险的封锁区。数日后，船抵大连港，顺利完成了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此后，“东方”轮继续执行护送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北上前往解放区的任务，为保证新政协的如期召开作出了贡献。

“东方”轮不断往返于香港和大连、天津港，把解放区的农产品运往香港销售，并将香港采购到的原材料，支前物资如：药品、渡江战役急需的救生圈等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还向刚刚解放的海南岛送去5万吨泰国进口大米，保证了新政权的平稳过渡。

参与策动海辽轮起义

在中共香港工委和华润公司的领导下，刘双恩在香港广泛与海员联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参加革命。1945年刘双恩在重庆海关测量船上结识了方枕流，多次送他进步书籍。1948年，方枕流已经是海辽轮的船长，刘双恩经常与他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有一次曾试探方枕流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工作，方枕流表示愿意。1949年5月，海辽轮航行到上

海，国民党招商局通知全体船员准备去台湾，“何去何从对方枕流来说已迫在眉睫”。6月，海辽轮运货到香港，刘双恩与方枕流彻夜长谈，方枕流决定起义，还和刘双恩探讨了直接驾船驶往大连解放区的计划。第二天，刘双恩又与方枕流会面，具体研究了电报密码、大连港口的呼号波长、航海线路。随后，方枕流马上赶回广州，召集海辽轮上的十几位骨干船员开会，做好了起义的组织准备。刘双恩向领导汇报了海辽轮起义的准备情况，又和王兆勋出面在香港九龙南国酒家为方枕流饯行。刘双恩又在尖沙咀码头附近看着海辽轮驶出码头，并用手电筒打灯语告别，祝他们“航途平安”。1949年9月中旬，海辽轮成功起义，安全抵达大连。

海辽轮起义后，香港海运业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不久，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及其所属的40余架飞机、4000余员工通电起义；停泊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和锚地的“海康”轮等13艘轮船同时拉响了汽笛，700多名船员宣布起义。在这些起义酝酿过程中，刘双恩均有参与。他曾将方枕流的亲笔信交给“两航”和招商局负责人，对动员起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粉碎帝国主义海上封锁、
禁运不遗余力

华夏公司初创时期，使用党的经费购买“东方”轮和“奥弥陀”轮，以后

则是“掌握行业规律，灵活运作资本，以船养船，滚动发展”。由于刘双恩等人的努力，华夏公司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司已建成包括“港星”“碧蓝普”“梦狄莎”“梦狄娜”“莫瑞拉”号在内的7艘轮船船队（后4艘为万吨轮船），迅速打入国际航运市场，其航运足迹已经遍布亚洲、欧洲和美洲。在刘双恩带领下，华夏公司成员虚心向专家学习，很快掌握业务技能，并精通多国外语。1950年3月起，刘双恩又兼任新西兰船务公司经理，仍属华润公司。其间，刘双恩等曾想方设法购买各国的旧舰艇，拆卸发动机、零件回国，用于组装人民海军的战舰。这些战舰在解放万山群岛和海南岛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封锁中国沿海，还联合一些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对华禁运”。为粉碎海上封锁、禁运，刘双恩等人领导华夏公司在多条战线上开展了不屈的斗争。刘双恩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和社会主义国家合资创办海运公司”的建议，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51年10月，中国波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率先成立，华夏公司所属的3艘万吨级轮船作为中方的投资转入合资公司，悬挂波兰国旗，由波兰人担任船长，船员基本上由华夏公司的干部担任。为此，公司所属船名也进行了相应改动。中波公司的经营很快取得了成功。此外，华夏公司还开办了租船业务，其中包括租用英国的“东风”号和“西风”号等货轮进行海上运输。通过这些办法，华夏公司积极团结海外运输界的同仁，一步步打开缺口，为祖国成功回运了很多紧缺的战略物资。

在反帝国主义禁运的斗争中，刘双恩还敏锐地注意到，当时我国海轮使用的珠江江口航道有两个致命缺点：第一是吃水只有13呎，不能进出大型船只，还受潮汐影响，滞港时间延长，浪费外汇；第二是沿珠江东岸行驶，驶出大铲岛即进入香港海域，一旦英国政府追随美国，港英当局就会封锁香港水域。为此，刘双恩等人在呈请组织批准后，派刘辛南乘船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并积极搜集了相关数据，最后发现了一条新的航道（垃圾尾航道），这条航道吃水28呎。经中央政府批准，广州港务局组织力量清除水雷和障碍物，建立航行标志，于1950年冬季启用。1951年5月，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实施所谓“对华战略禁运”，航道的作用立即显现出来，在粉碎“禁运”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刘双恩鉴于湛江港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可以建设为中国西南、华南地区货物水运进出口的主要通道。于是派刘辛南等前往勘察，对湛江港周边的水文特征、区域环境、气候条件等数据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把“建议开发湛江港”的请示上报。1953年，政务院决定在湛江建设一个新的商港并同时兴建黎湛铁路。

（作者单位：中国商务出版社）

史海
观澜

SHIHAI GUANLAN

徐海东在莱阳过春节

王小梅

徐海东在革命战争中多次负伤，积劳成疾，1940年患重病后，仍坚持随军指挥作战。1947年1月，组织上安排徐海东转移到老解放区——莱东县思格庄治病休养。

徐海东进村后的第二天，就向村干部打听村中烈军工属的生活状况。当得知烈军工属的土地都安排专人代耕后，他满意地说：“烈军工属就如我们的亲属，尤其是烈属，他们的亲人为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捐躯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应该好好地照顾他们。”

为了给徐海东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警卫战士和村干部主动劝说当地群众路过时，不要大声说笑，牲口经过时，不要吆喝牲口和响鞭子；又劝说炉匠打铁时，尽量压低铁锤声。乡亲们也都乐于听从。徐海东发觉自己的住所周边突然变得安静了，立即明白“这是警卫同志干的”，就对警卫同志说：我听到群众的愉快歌声和有节奏感的劳动响声，感觉既踏实又高兴，希望大家不要光顾我的病，今后办事情要多为群众着想。说罢让警卫战士向群众表示感谢，并告诉大家“一切照旧”。

徐海东进驻村子不久，就到春节了。腊月二十九这天，深知当地习俗的徐海东立即安排警卫连出发，分别到群众家里帮助清扫庭院、挑水劈柴。第二天上午，徐海东又安排战士们去帮助群众贴对联，给烈军工属挂“光荣灯”。正月初一，徐海东让警卫连挨家挨户给群众拜年；又让警卫连

准备节目，在正月初一、初二、初三的晚上举办军民联欢会，和群众同庆佳节，共叙鱼水深情。

徐海东警卫连的战士大多数是南方人，初到胶东解放区，对这里群众的生活习惯有些不适应。徐海东就言传身教，让警卫连战士尽快适应当地的生活。正月里，村里提供的主食主要是粗谷饼子。有的同志说“既粗糙又牙碜”。徐海东听到后，就教育大家说：“这些粗谷饼子是本地群众的节日饭和客饭，是给家中上山干活的男劳力吃的。我们今天能吃上这样的饭，已是地方上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办得到的事了。我们要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与他们同甘共苦。”接着就带头吃粗谷饼子，一边吃一边说：“吃粗谷饼子就得像我这样，嚼一口饼子，喝一口水，咕咚一声向下咽。”“我们要在全国各地与敌人作战，既要学会行军打仗，又要学会在各种条件下食用不同的食物。我们有这两套本领，就能够无往而不胜。”战士们徐海东的带领下，很快掌握了吃粗谷饼子的“技巧”。

群众又送了些花生、芋头给徐海东和战士。徐海东见战士们光吃花生不吃芋头，就招呼大家吃芋头，说这是本地特产，很好吃。谁知话音刚落，一名战士问：“首长，这东西怎么做好吃？”其实，徐海东也是第一次见当地的芋头，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他就笑着回答说：“行军作战我是内行，论种庄稼我可就不如乡亲们了。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这问题你们还是去请教乡亲们吧。”

史海
观澜

SHIHAI GUANLAN

谢家庆率部夜袭芦家庄火车站

佟雪辉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斗打响。1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接到了夺取芦家庄火车站的任务。

芦家庄火车站位于山西省寿阳县芦家庄村，是日军在正大铁路上的重要站点之一。据侦察员报告，火车站位于芦家庄村东，站内除了仓库、兵站外，在四周筑有7个碉堡，外围还有4道铁丝网和壕沟；村南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正值雨季，河水湍急；守敌是日军一个中队，有曲射炮、重机枪、掷弹筒等武器。

团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一个连牵制冀家垣据点之敌，一个连牵制榆次、长凝之敌；两个连配合寿阳（路南）县抗日自卫队、工兵部队破坏铁路；集中5个连的主力采取夜袭战术消灭芦家庄火车站内的守敌。全团按上级规定的时间，于20时发起战斗。

8月20日19时左右，团长谢家庆率十六团指战员秘密赶到芦家庄外围，沿着河流和山谷，紧紧把敌人包围起来。突击队有的进至敌人碉堡外几十米处，有的匍匐至敌人铁丝网下，开始拆除铁丝网之敌。当拆除第四道铁丝网时，声音惊动了敌人哨兵，谢家庆当即命令强攻，原定于20时开始的战斗提前打响。

战斗打响后，十六团两个连抢渡

小河，迅速占领了芦家庄，并立即由西向东攻击车站、兵站守敌。不久，另3个连也炸毁了前进道路上的5个碉堡，由东向西朝车站发起攻击。两支部队合力猛打，车站里的守敌根本没有预料到八路军会发起如此大规模的攻势，仓皇应战，很快便放弃车站，向外突围逃窜，遭到伏击后，又慌忙向其他方向突围，结果又被八路军打了回来，只得退守兵站仓库继续顽抗。谢家庆立即指挥战士们找到缴获的日军燃烧弹，用曲射炮弹对准仓库打了过去，仓库中弹起火，里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残部再次拼命突围，窜入旁边学校一间坚固的教室中顽抗。十六团战士们爬上房顶，掀开屋顶向里面投入手榴弹，很快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歼灭。几乎与此同时，向榆次方向游击牵制敌人的两个连，配合工兵将芦家庄至榆次段的铁路桥梁全部炸毁。

此次战斗，十六团击毙敌人80余人，俘虏3人，缴获步枪53支，轻机枪两挺及曲射炮等重武器。战斗结束后，十六团指战员把缴获敌人的手雷捆在芦家庄铁路桥的桥墩上，炸毁了铁路桥。在随后的几天里，十六团留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民兵和当地群众一起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线杆……将芦家庄火车站东西十里以内铁路桥梁，完全破坏，有效地阻止了阳泉、榆次、太谷之敌东援。

史海
观澜

SHIHAI GUANLAN

广州的八一三献金救亡运动

李臣

1938年7月，广州成立了“广州各界纪念八一三献金运动筹备委员会”。中共广东党组织做了实际的组织发动工作。

经过前期运作后，广州市政当局分别在六二三路、西濠口、中央公园前、文昌路、大南路、永汉路警察分局、河南海幢警察分局等处搭起献金台。8月13日当日，各机关团体代表及普通市民相继解囊捐献，当日捐款便已达50万元。当晚还举行了10万人的反日献金大游行。游行群众高呼“保卫大广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全程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受到沿途市民的热烈欢迎。

西濠口是当年广州的闹市区，车水马龙，极为繁华。8月15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广州分馆在西濠口举行联合献金大会，廖承志作了即席讲话，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并号召共产党员带头献金。活动开始后，两个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共产党员带头捐款，不少人多次献金，现场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国共合作万岁”等口号，场面极为热烈。

广州各界群众把工资、积蓄、金

银饰品捐献出来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中外的有组织和领导的群众性募捐运动。有着“中国的马可波罗”之称的旅行家张尚仁，尽数献出多枚各国人士赠送的金纪念币章，并说道：“我将纪念章献出，也就是表示献出了我的一切，献出了中国青年的精神，希望大家能将其一切财力、精力都献给祖国，也献出赤诚爱国之心。”擦鞋童吴成定小朋友，献金逾百次，每次几毫甚至1元；年仅12岁的陈曼章，每天自备鲜花、水果上街叫卖，将其所得全部投入献金箱；邓满是一位老工人，已年过花甲，硬是将平生积攒下的50元全部献出；老人何黎氏将自己的结婚纪念金饰捐出……

侨居广州的外国友人也积极响应献金运动，活动当天，到六二三路献金台献金者多达数十人。一位来自印度的国际友人在捐献后说道：“我只能贡献一点力量，来帮助我们自卫的兄弟。”

截止至8月19日，广州全市共收到献金捐款100余万元。广州群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参加“肃奸除霸活动”，慰劳抗日将士和伤兵，组织人员参加战时运输和救护工作，组织战地服务队赴前线慰问……此后，献金运动迅速在广东全省展开，为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垛河口伏击战

贾晓明

1945年4月下旬，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一分区副司令员）刘飞得到地下党组织送来的情报：盘踞在江苏省宝应县县城的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在日军的“护送”（实为监视）下，从公路和河道水陆并进，前往兴化南面的周庄驻防，途中将经过高邮以东的三垛镇、河口村等地。不久，苏中军区司令部通信科技侦察台的同志，也截获、破译了敌人的密码电报，进一步确认了该敌敌人的行动时间、路线、使用交通工具数量等情况。

刘飞和第一军分区领导商议后，决定坚决消灭这股敌人。苏中军区首长得到刘飞等的报告后立即批准了作战计划，并集中十八旅五十二团，十八旅旅部兼一分区特务营，三分区特务团，高邮、宝应、江都等独立团等部队参战，由刘飞统一指挥。

战前，刘飞亲自对敌人将要通过的公路、河道、村镇进行了缜密的侦

察，最后把伏击战场设定在三垛镇至河口村之间、北澄子河北岸新庄到野徐庄一线约3.5公里的狭长地带。这里村庄多，河汉纵横，便于隐蔽；同时，这一地区的公路与河道平行，公路、河岸两侧几乎没有树木遮挡；受暴雨影响，河水猛涨，导致水面几乎漫上了公路。因此不论敌人在公路上行走或乘汽艇在河上行驶，设伏部队均可清晰观察其动向。

选定伏击战场后，刘飞随即召集参战各部指挥员开会，将各参战部队组成河南、河北两个纵队，分别部署在公路以北和北澄子河南岸，又在包围圈外的三垛镇以东和河口村以西地区也部署了部队，负责阻击三垛、河口据点日伪军的增援，堵住敌人。

4月27日拂晓前，所有参战部队秘密进入阵地。为了迷惑敌人，一批新四军战士化装成群众，或在沿途的商店里“营业”，或进入田野间干农活，或驾车在河上通行，等候敌人的到来。

28日午后2时，刘飞接到侦察员报告：日伪军约2000人从三垛镇出发，分水陆两路向东行进，已经通过了新庄。由于敌人怕遭到伏击，特意摆了“一字长蛇阵”，各部队之间间隔拉得很大。为了让敌人“聚在一起进口袋”，新四军事先在伏击圈外的公路上挖开一个5米宽的沟，并将河水引进沟内。敌人先头部队被沟所阻，只得向河中的敌人要了几只小船，拉到沟上搭浮桥。其间，后面的敌人也陆续到了，乱哄哄拥挤在一处。3时左右，敌人改“一字长蛇阵”为四路纵队的密集队形，渡过浮桥继续前进，很快进入了新四军的伏击圈。

随着刘飞一声令下，信号弹腾空而起，埋伏的新四军各部同时开火。日伪遭受突如其来打击，顿时乱作一团。河上的3艘汽艇，很快被击毁两艘，堵住了河道，后面满载辎重的20余艘木船挤在河里动弹不得。船上的敌人纷纷跳水，被南岸的新四军一阵扫射，死伤